

云南文史

巧取皎平渡

张李明

皎平渡,位于川滇交界之处,南岸是云南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北岸是四川会理市,自古以来就是金沙江的重要渡口之一。此处江面宽阔,水流湍急,难以徒涉,两岸高山崖壁,极为险峻。

1935年4月底,中央红军兵分三路快速赶往金沙江畔。国民党已发现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的战略意图,便派飞机每天对渡口进行侦察。毛泽东同志便把夺取皎平渡口的任务交给中央纵队干部团(以下简称“干部团”)。

同年5月2日,干部团从柯渡出发向皎平渡行进。沿途一百多公里都是崎岖山路,经过一昼夜强行军,先遣连抵达金沙江边。在渡口处,先遣连在船工的帮助下找到一条船,先遣连很快完成战斗部署,连长萧应棠率一排、二排先渡江,控制渡口,三排担任警戒,随时准备火力支援。

船只靠岸后,两名战士顺着石级向上摸去,突然传来喝问:“喂!你们怎么搞的?才回来。”两位战士没有回答,加快脚步,待到离敌哨兵几步处,猛地扑上前去,俘虏了敌哨兵。萧应棠令一排顺街向右消灭敌边防连,二排向左打保安队,渡船则返回接后续部队。同时按预定计划,在江边烧起茅草,向对岸报告偷渡成功。

一排摸到敌边防连驻地时,迅速俘虏了敌哨兵。全排人冲进院子,分头踢开几个房屋门,大喊:“缴枪不杀!”只见各屋都烟雾腾腾:“莫误会,莫误会,我们是今天才到的,咱们是自己人。”红军战士大声说:“我们是红军,正是来找你们的。”敌兵在红军乌黑的枪口下,乖乖地按照命令走到院子里集合。只有敌连长和几个军官在另一间屋子里,听见声音,知道不妙,打了几枪就逃跑了。二排在船工张朝寿的帮助下,冒充交税的百姓敲响了重金局的大门,保安队听说有人缴税,喜出望外,忙打开了门,结果糊里糊涂地做了红军的俘虏。干部团先遣连兵不血刃,便夺取了皎平渡口。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皎平渡那段红色记忆至今仍留在人们心中。
本报记者 黄兴能 摄

中央访问团到云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镜鉴

吴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党所处历史方位和面临形势的变化,尽管没有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增强各民族的爱国爱国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一心跟党走成为共识。1949年9月,随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的颁布,极大强化了各民族共同建设新中国的向心力,为疏通民族感情消除民族隔阂,中央决定组织进行“走下去”和“请上来”活动,其中“走下去”就是组建中央访问团。1950年7月2日,中央政府首先向西南各民族地区派出访问团,访问团坚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方得人心,赢得了边疆各民族的广泛赞誉,强化了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意识,增进了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2025年是中央派出访问团的第75个年头,从党的民族工作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对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直抵人心织就情感纽带。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各族人民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为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加强中央与各民族间的联系,了解党的民族政策落实情况,从1950年至1952年,中央先后派出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内蒙古4个访问团。这次“对各族人民作历史上第一次平等友好的访问”,是毛泽东同志提议的,他亲自接见了西南访问团全体同志,亲笔题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起来”的条幅,作为礼物送给各兄弟民族,亲自对中央访问团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一是要依靠当地领导,二是一切工作坚决遵循《共同纲领》中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方针,不要做少数民族不喜欢、不愿意做的事情,三是对过去的反动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犯下的罪恶,要赔礼道歉,把过去民族压迫的历史宣告结束。按照“走下去、请上来”的指示以及“慎重稳进”的民族工作指导方针,周恩来同志亲自确定访问团名称,并审阅了访问团《组织草案》《经费预算草案》《学习计划草案》等相关文件。邓小平同志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访问团大会上

发表了《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指出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要我们真正按照共同纲领去做,只要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就能把事情办好。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分团由夏康农任团长、王连芳任副团长,于1950年8月6日到达昆明,受到云南省党政军和各界代表的热情欢迎。在历时10个月的工作期间,中央访问团深入云南各民族地区走访慰问,共访问了9个专区、42个县,行程18400公里,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参与民族地区政权建设,进行民族情况调查,极大地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巩固了祖国大家庭的团结,揭开了新中国民族工作的新篇章。

以心换心消除民族隔阂。1949年前,由于国民党长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民族隔阂很深,边疆地区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在此情势下,中央访问团的任务、工作方法和守则明确访问团代表中央向西南各兄弟民族进行宣传、慰问,以加强中央与各兄弟民族间之联系。对西南各兄弟民族之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民族关系、群众要求以及当前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形,有重点地进行调查研究,并搜集有关资料。《周恩来、维汉致刘伯承、邓小平的信》中提到“该团到少数民族地区,第一等任务是搞好民族关系,凡是少数民族不欢迎去的地方不要去,不同意做的事情即不要做”。邓小平同志强调:“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为完成这一任务,中央访问团在云南期间,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如中央访问团到丽江后,参加了象征滇西各族人民团结的丽江区各民族代表会议,向各族代表赠送党和国家领导人题字锦旗、照片和礼品,同各族代表座谈,倾听意见,了解到滇西北地区各民族头人之间矛盾牵涉面广,就把解决民族头人矛盾作为调解疏通工作重点,通过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and 交谈谈心,使大家认清形势,积极消除历史上形成的多种矛盾,促使一些多年的冤家打消顾虑、解开心

结、言归于好。又如,中央访问团到普洱后,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正确分析民族问题的内在关系,为普洱民族工作的良好开端打下牢固根基。中央访问团根据普洱的实际情况,将普洱的10多种矛盾归纳为4种矛盾,一是敌我矛盾(境内与境外残匪的矛盾);二是阶级矛盾(民族上层与下层群众的矛盾);三是民族矛盾(各民族间历史遗留的严重隔阂);四是部落矛盾(民族内部),强调必须集中精力搞好民族团结、做好事、交朋友,争取群众。根据“慎重稳进”的方针,中央访问团周到耐心地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使各族群众真心拥护民族区域自治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实现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最好形式,顺利成立了普洱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为党的民族政策、统战政策、群众工作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推行创造了良好条件,各族代表颂扬“这是自古以来没有的大事”。

深入民心促进民族团结。作为边疆多民族省份,云南各民族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在中央访问团到来之前,尚未对云南的民族情况进行过全面系统的调查,中央访问团设立之初就明确担负着社会调查和收集各族群众意见的任务,相应在组成人员中吸收了大量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到云南后,围绕深入了解各民族的民族关系、经济情况、政治情况、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情况等,对云南少数民族第一次进行全面、系统、大规模的调查,为开创新中国民族研究工作新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央访问团遵照“了解各民族疾苦”“把各民族人民意见直接带给中央”的重要指示精神,通过个别访问、召开座谈会、进行专题或典型村寨调查等形式,翻山越岭,深入到各民族村寨,与各族群众促膝交谈,通过面对面接触充分了解掌握民族地区各方面情况。如,中央访问团到红河后,以多种形式了解情况,一是对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或各族各界代表人物进行个别访问;二是召开各民族、各阶层或各行业不同类型的座谈会;三是召开各族群众大会;四是召开民族代表会议,广泛了解当地民族情况及各族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中央访问团还分成若干

工作小组,选取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村寨进行访问调查,形成《蒙自区民族简况》《金平县民族简况》《红河县民族简况》等调研报告,这些珍贵的调查资料,被收入到《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一书,对了解红河各民族情况,制定党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翔实的一手资料。又如,中央访问团到保山后,直接带上书信、布鞋、针线、食盐、油布等礼品登门访问,向各族群众讲解党的民族政策,从进出门的礼节到生活习俗都虚心询问,认真遵守,取得了少数民族同胞的信任和支持。中央访问团的工作,极大改善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边疆各族群众的高度认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民族工作,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派出中央访问团到云南等边疆民族地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工作,是党的民族工作的一次大创新,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一次大宣传,是激励边疆各民族爱国爱党的一次大动员,在历史上第一次直接把中央政府的关心带给边疆各族人民,进一步密切了中央与边疆的关系,密切了各族群众间的关系,中央访问团所到之处传达党中央对各族人民的问候和关怀,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吹响了民族团结的号角,推动新中国党的民族工作迎来了新的“质变”。当前,党的民族工作进入一个崭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族工作关乎大局,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面深入具体地落实到各项工作中,需要我们更好学习借鉴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务实工作作风和管用工作方法,找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感情的共鸣点、与少数民族群众切身利益的结合点、与民族地区发展实际的契合点,更注重增强各民族的情感共振、文化共通、心灵共鸣,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深厚的人文基础和更强大的精神支撑。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本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党对民族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3BKS06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丽江古城文化遗产传承与文旅融合

潘杨译函 兰青松

保护利用、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并要求当地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让这座美丽的古城焕发新的光彩。这与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在平遥古镇考察时提出的“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的论述形成呼应,深刻揭示了文化保护的时代命题。当今,构建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探索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化路径,已成为坚定文化自信、赓续历史文脉的战略命题。丽江古城建智慧成就自然与人文共生的千年典范。古城坐落于云贵川三省交汇之处,既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枢纽,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隘口。千百年来,往来马帮的蹄声与铃声在此交织。古城自宋元之际初建,历经百余载层积演进,在元、明、清及民国各时期逐渐形成独特的空间形态与文化肌理。其营建智慧犹如一幅天人对话的长卷:狮子山、金虹山、象山如苍龙环抱,形成“三山为屏”的天然格局,既抵御北风,又契合“藏风聚气”的传统哲思。玉泉水系自黑龙潭流出,分三脉穿城而过,先民依水筑屋,以水为巷,形成“顺流入城、逆流出郭”的空间逻辑。民居以“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为典型,沿山势布局,五花石铺就街巷,垂柳拂水,石映流云,

织就“家家流水、户户见山”的栖居画卷,在波光桥影间流淌出“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木府文化塑造了滇西北边疆多元共生的文明形态。作为古城核心建筑,木府是解读丽江文化的重要载体。木氏政权源自纳西古羌“叶”氏族支脉,在元明土司制度下形成“忠义立本、自治安边”的治理逻辑。其中“官民异姓”制度尤为突出:统治阶层姓“木”以示国家认同,百姓姓“和”以维系族群血脉,体现了“附汉和蕃、多元共融”的治理智慧。木氏设“万卷楼”引入儒学典籍,培养纳西精英研习诗书,催生以“木氏六公”为代表的汉文创作群体,《明史》誉其“知诗书,好礼守义”。依托茶马古道,汉藏文化在此交融,实现技术、艺术与建筑技艺的双向渗透,形成“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文化范式,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地方典范。纳西族东巴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样本。东巴文字作为迄今仍在使用的原生象形文字系统,以依类象形之法构建出“一字一世界”的符号宇宙,承载着纳西先民对自然与生命的认知。东巴经籍涵盖宇宙起源、族源迁徙、生命礼仪等主题,融合哲学、伦理、文艺、医学等多维内容,是纳西文明的知识

图谱。东巴文化深植民间,贯穿于农时测算、医药实践、民居营造等日常生活,在实践传承中保持活力。这些不仅是纳西族的精神史诗,也为中华文明保持文化多样性提供了重要根基。丽江古城文旅融合范式为世界文化遗产型城市提供一定参考。凭借“三遗之城”的独特地位,丽江构建起自然与人文互文共生的叙事体系:玉龙雪山与拉市海湿地构成生态画卷,茶马古道积淀出古城肌理,东巴文字与纳西古乐通过现代设计与数字媒介重焕生机。改革开放以来,丽江实现了从边地聚落到国际旅游目的地的跨越,形成“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互动发展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旅产业要走一条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丽江的实践为世界文化遗产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也为全球文明多样性贡献了东方智慧。岁月潺潺,文脉悠悠。丽江古城是一部跃动于时光长河的生命史诗,在保护与发展中持续焕发活力。我们应秉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继续探索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路径,让这座千年古城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风物

白族霸王鞭的文明演进与文化认同

李源江



白族打跳体验和白族霸王鞭舞教学活动。
本报记者 王毅 摄

在云南省大理、洱源、剑川、云龙、鹤庆等县市的白族聚居村落,白族霸王鞭不仅是体育活动的展现,更是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传承。尤其在洱源县炼铁、凤羽、右所和大理市喜洲、海东、双廊等乡镇最为流行。它如同一道绚丽的彩虹,将白族人民的日常生活装点得色彩斑斓,成为节日庆典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盛宴。每当庆典来临,身着节日盛装的白族金花们,以轻盈的舞步和欢快的节奏,伴随着悠扬的乐曲,为广大村民带来了一场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白族霸王鞭舞在大理地区的多个重要节日中都扮演着祈福与欢庆的角色,如火把节、绕三灵、三月街等。舞者手持霸王鞭,右手挥动鞭身,左手随之拍击,身体随着鞭子的摆动而扭转,通过鞭子碰击身体主要关节发出的清脆声响,配合上身的抖动、小腿的变化以及双脚的跳跃,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舞蹈画面。

白族霸王鞭有着不同的称呼,白族话叫“搭哇别”“得且嘎”“的度靴”,“得且嘎”意译为“打钱杆”,而“的度靴”则是模仿霸王鞭响声的白话拟声词。这些名称不仅体现了语言的多样性,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霸王鞭上的装饰,如四个长方形孔和嵌入的铜钱,分别象征着四季和十二个月或二十四节气,展现了白族人民对自然规律的尊崇和遵循。霸王鞭在白族村落中起到了凝聚村民的作用,不仅增强了村民的体质,更促进了农户之间的联系,加深了他们对村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随着时代演进,霸王鞭亦不断吸纳新的艺术养分。如今的白族人民巧妙融合传统形态与现代健身理念,融入了更加丰富的舞蹈语汇与音乐韵律,使其焕发出蓬勃生机,更贴近当代审美意趣。霸王鞭的起源可追溯至古代战场,最初为战士所用之兵器,承载着白族先民骁勇与坚毅的气质。在历史的长河中,它逐步由兵器蜕变为一种集健身与美感于一体的活动形式——既保留了原有的刚健力道,又注入了舞蹈的柔婉与和谐,成为白族村寨中独具风情的文娛传统。如今,霸王鞭早已深深融入白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农忙间隙,乡野田畔,常可见村民随手执霸王鞭,应和节拍翩然舞动,尽享其间流转的欢愉与生机。每逢新春或重大节庆,霸王鞭更成为庆典中不可或缺的精华部分,家家户户踊跃参与,在整齐的舞步中凝聚亲情乡谊,共酿祥和喜悦。白族民间艺人亦不断推陈出新,将传统乐舞与霸王鞭灵动交融,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表演形式。这些创作不仅深受本地群众喜爱,更逐步走向其他地区,登上多样化的舞蹈交流舞台,使白族文化与霸王鞭的风采远播四方。

白族霸王鞭蕴含健康昂扬、欢庆祥和、形神兼备等多重风貌,日益受到各族同胞与国际友人的青睐与传习。为扩大其影响力,白族村寨的艺人与文艺团队持续致力于推广工作,使霸王鞭队伍不断壮大、薪火相传。与此同时,各方积极借助多种媒体平台,录制雅俗共赏的霸王鞭舞姿影像,通过短视频等方式广泛传播,引来数以万计的共鸣与赞誉,让这一艺术形式突破地域局限,绽放在更广阔的天地之间。

植根于白族文化沃土,霸王鞭乃是体育与舞蹈相融的独特载体,凭借其隽永的魅力与深厚的影响,已成为白族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精神印记。在大理这片丰饶的土地上,白族霸王鞭正焕发着愈加璀璨的光芒,传递着白族儿女的热忱与友善,也为一个个村庄注入了欢愉与生机。

(作者单位:洱源县炼铁乡江旁村村委会)



丽江古城和玉龙雪山“日照金山”的壮美景观。 本报记者 陈飞 摄